

DOI:10.16366/j.cnki.1000-2359.2017.04.022

# 公众史学在中国:发展路径与理论建构

王记录,张嘉欣

(河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7)

**摘要:**从学术渊源上看,中国公众史学是美国公众史学与中国本土史学大众化交融汇合的结果。20世纪80年代,美国公众史学传入中国,在新世纪引发了史学界对公众史学概念、特性的讨论,并试图以此为参照建构中国公众史学学科体系。中国本土史学大众化源远流长,新中国成立后,史学大众化在实践与理论两个层面上同时起步,成为中国公众史学的本土学术资源和实践基础。当下,中国公众史学在发展路径上应立足本土,借鉴西方,走出一条符合中国自身社会及历史实际的公众史学发展道路。在理论体系和学科体系建构上,必须考虑中国国家与社会的特点及公众史学与专业史学的复杂关系。继续进行多学科对话,深化理论探讨,把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以丰富的实践催生原创性理论。加强公众史学各分支学科的研究和实践,利用不同的文化资源丰富中国公众史学的发展样态。

**关键词:**公众史学;应用史学;史学大众化;中国;美国

**作者简介:**王记录(1964—),男,河南范县人,历史学博士,河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史学史、历史文献学研究;张嘉欣(1992—),女,河南安阳人,河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研究生。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1&ZD109)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359(2017)04-0122-07 **收稿日期:**2016-12-01

新世纪以来,公众史学日益受到人们关注,相关研究成果越来越多,甚至出现“21世纪是公众史学的时代”的说法<sup>[1]</sup>。但是,迄今为止,公众史学在中国的发展依然遭遇到诸多问题,在发展路径、理论建构、学科体系、实践操作等方面,都还存在诸多分歧,需要深入探讨。公众史学各分支学科的研究和实践更是薄弱,有些尚属空白。为了推动中国特色公众史学的深入发展,从史学史的角度梳理公众史学在中国的发生发展过程,实属必要。从来源上看,中国公众史学渊源于美国的公众史学和中国本土的史学大众化。新世纪以来,这两股来自中外的史学思潮碰撞在一起,成为中国公众史学发展路径和理论建构的知识基础、实践基础和学术依据。

## 一、美国公众史学在中国的传播

美国的公众史学(public history)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首先于1976年开始了公众史学研究生项目。随后,《公众史学家》(Public Historian)杂志的发行和美国国家

公众史学委员会(National Council on Public History)的建立标志着美国公众史学的正式起步。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时至今日,美国公众史学已在挑战中走向成熟,成为在美国颇具影响力的史学流派。

最早向中国史学界介绍美国公众史学的是著名史学家罗荣渠先生。1982年,他首次提到了美国的公众史学,指出20世纪70年代,由于美国大众化历史的兴起,“在高等学校中一门新的学科分支‘公共历史学’(public history)或‘实践历史学’(practical history)应运而生,为各历史博物馆、历史机构、政府部门训练‘公共历史学家’。在加州大学桑塔·巴巴拉分校设有公共历史专业,并出版杂志《公共历史学家》(The Public Historian)”<sup>[2]</sup>。并认为这是美国历史学发展的一个新方向。1989年,王渊明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向国内史学界介绍了美国的公众史学,文章指出美国公众史学起源的直接原因是历史专业的学生就业差、历史系招生缩减、史学研究者出版论著困难等,面对史学危机,公众史学崛起。他着重介绍了美国公众史学的三大派别,第一派主要“从事以

历史为内容的各种体裁作品的创作”，包括历史通俗读物、历史小说、各种历史影视剧、广告等。第二派是“应用历史学”。这一派强调历史学的实用性，认为历史学在政治活动、政府管理、公司和企业决策、新闻传媒、历史遗产保护、档案管理、社区及家庭历史的书写等领域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第三派是“人民史”学派。这一派主要通过口述等方式专门研究与普通民众相关的领域和题目，注重民众的共同参与<sup>[3]</sup>。1990年，游恒发表《公共历史学在美国的兴起与发展》，认为所谓公众史学，就是“历史学为公众服务，为社会服务”，并认为美国的公众史学从开始出现的那一天起，就把学院派史学(academic history)作为自己的对立面，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上向学院派史学发起挑战，形成了自己的新体系。它根据美国学者的研究，把公众史学归结为帮助制定政策、文化资源管理、公众历史学的教学三大内容<sup>[4]</sup>。尽管有罗荣渠、王渊明、游恒等学者的介绍，但在20世纪80、90年代，美国公众史学并未引起史学界的关注，几乎没有产生任何回响。美国公众史学真正引起中国学界重视，是21世纪以来的事情。

进入21世纪以后，学界对公众史学的研究明显深入。陈新、王希、姜萌、李娜、钱茂伟、代继华等人对美国公众史学的发展及特点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与此同时，孟钟捷、王桂香、肖琦、朱联璧等人对德国、法国、英国、俄罗斯等国家的公众史学也进行了介绍和研究，为中国史学界认识公众史学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提供了帮助。

这一时期学界对国外公众史学——特别是美国公众史学的研究更加深入，在公众史学的概念、特性、学科建设三个方面创获颇多，为以后公众史学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其一，公众史学概念的讨论。推动公众史学在中国的发展，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公众史学的概念问题。概念不清，必然内涵不明。在美国，公众史学用“public history”指代，这一词汇翻译到中国，有“公共史学”、“公众史学”、“大众史学”、“公共历史”等多种译法。讨论公众史学问题时，学者们根据自己的理解，各执一词，令人眼花缭乱，因而需要名责实，统一概念，以利于公众史学的学科建设和传播。姜萌把中国本土的“通俗史学”概念和“大众史学”、“公共史学”进行了比较，认同“公共史学”的提法，认为在范畴上，“公共史学”可以包容普及型、应用型史学；在立意上，“公共史学”注重公共历史观念、历史意识的建构，使史学在公共社会的建构中体现自身的价值；在书写手法上，“公共史学”也突出了用民众的日常生活话语系统叙述、写作；在参与范围上，“公共史学”真正体现了“人人都是史学家”的观念，模糊了职业史学家与非职业史学家、学者和公众的界限等<sup>[5]</sup>。对于“public history”，王希主张翻译成“公共史学”，认为“公共史学”比“公众史学”的含义要广。他认为“公共史学”至少覆盖三种范畴内的史学创作与实践，即“公共事务”、“公共领域”和“公民文化”。“公共事务”包括政府等官方机构制定的政策法规及兴办的文化事业，“公共领域”则覆盖服务于公众的媒体、

企业、商业等领域，“公民文化”则包括中小学历史教材的编写以及塑造公民素质的大众文化等。与之相关的史学活动均为“公共史学”。这些范畴所覆盖的内容与“公众”密切相关，但又超出“公众”的范围<sup>[6]</sup>。陈新则主张使用“公众史学”，即在实践领域称“公共历史”，在学术领域称“公众史学”。当在学术领域中使用“公众史学”的概念时，主要是指这个史学研究和表现领域的公众参与。“公众史学”的核心在于人人都可成为自己的历史学家，每个人都有叙述历史的权利<sup>[7]</sup>。钱茂伟通过仔细辨析“公共史学”、“大众史学”、“公众史学”的异同及关联，指出“公共史学”是空间层面的概念，“大众史学”是人群内部的划分，“公众史学”是人为本位的概念，“从未来公民社会的发展趋势来看，使用公众史学更为理想，它主体明确，反映的是‘人为本位’的新史潮”<sup>[8]7-8</sup>。

经过反复讨论和辨析，学界大多数学者都主张统一使用“公众史学”这一概念，以体现人人都是历史学家这一主题。

其二，公众史学特性的认识。美国公众史学兴起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直接动因，即史学出现危机，历史专业学生遭遇就业难，历史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不得不改变<sup>[9]</sup>。二是学术动因，即后现代主义思潮瓦解了专业史家的权威性，为历史学带来了一场范式革命，使公众史学的多元历史写作成为可能<sup>[10]</sup>。这样的兴起原因既给公众史学打上了鲜明的烙印，又给准确定义公众史学造成了困难。“公共史学究竟是什么，它的内容与形式应该如何界定，即使在美国公共史学内部也没有形成共识”<sup>[6]</sup>。但这并不意味着公众史学的特性无法确定。通过讨论，人们已经在公众史学的特性方面获得了相对统一的认识。

中国学者对公众史学特性的认识是通过梳理美国公众史学的发展过程而获得的。美国公众史学的最早发起人凯利最初使用公众史学的概念时，“主要是指史学知识和史学技能运用于学术界以外的场所中，这些场所包括政府机构、私人企业、大众媒体、各地的民间历史学会或组织，以及各种各样的博物馆等”<sup>[9]</sup>。公众史学就是历史知识在公共领域中的运用。而另一发起人约翰逊则认为公众史学是一种多维度的新兴史学领域。公众史学的最基本特征就在于它是一种使公众受惠的历史学科。它可以在政府机构、商业、研究机构、媒体、历史遗产保护、历史学会及家族史和博物馆、档案和历史资料管理、教学等八个领域发挥作用<sup>[9]</sup>。不能把公众史学简单地理解为实用史学，公众史学与传统史学(学院派史学)一样在创造新的知识。随着美国公众史学的发展，人们又倡导历史学家与公众携手进行历史书写，强调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和共享历史话语权。“美国公众史学的缘起和演进表明，它实质上是一种强调受众的问题、关注点和需求的历史实践……公众史学的话语权在于公众，公共空间的所有权也在于公众”<sup>[11]</sup>。公众史学的特性有两个：“一是研究主体转变为公众，二是研究内容和目的着眼于公共领域。”<sup>[12]</sup>公众史学不仅是让历史回归到公共领域和公众生活中，而且要让公众参与到历史的记述和解释中来，“公众史学是指公众在反思自我历史意识和历史认识生成的情形下所

进行的历史表现与传播”<sup>[13]</sup>。公众史学的出现意味着“专业历史学家长期以来拥有的史学话语霸权已经动摇了”<sup>[9]</sup>。由此,钱茂伟认为“公众史学是以公众为中心的史学体系,是公众本位的新史学”<sup>[8]12</sup>。尽管人们对公众史学的认识还存在差异,但公众史学最核心的内涵已经被揭示出来了。

在资料运用和研究方法上,公众史学更具有开放性。公众历史学家在研究问题时使用的材料是多元的。除文字资料外,口述、图片、影视、文物、建筑等各种资料都是他们赖以分析的重要材料。公众史学的研究方法也是多元的和跨学科的,必须大量借鉴社会学、地理学、人类学、艺术学、民俗学、商业管理、政策研究、统计学、美学、心理学、图书馆和信息管理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并允许其他学科的学者也涉足公众史学的课题。

其三,公众史学学科构建的努力。在介绍美国公众史学的同时,不少学者也从此入手,借鉴美国公众史学的做法,更多地从外部观照中国公众史学的学科构建问题。在这方面,王希、陈新、李娜、姜萌、周梁楷、钱茂伟等学者做了很多工作。

王希认为公众史学要想在中国史学界立足,首先要取得专业史学家的支持,在学科设置上要把公众史学考虑进去,要利用现有的教学体制开展公众史学的教学和人才培养,有效利用中国现有的公众史学资源,开展实际工作<sup>[14]</sup>。可惜他没有提出具体的学科内容。陈新从公众史学人才培养的角度把公众史学培养目标分为四个层次,即社会道德与价值观分析与培育;传统职业历史学方法论与实践性训练;跨学科的知识储备;公众历史知识生产的组织和实务操作<sup>[13]</sup>。他还将新兴的自媒体纳入公众史学的关注范围,指出自媒体下的“个人、群体、机构、国家都成为社会多元历史观的建构者之一”<sup>[15]</sup>。李娜借鉴美国公众史学这个“他山之石”,从课程设置方面对学科建设进行探讨,认为公众史学人才培养可设置以下研究方向:城市历史保护;公众史学与大众传媒;公众史学与影视;文化遗产史学<sup>[11]</sup>。此外,她还深入论述了公众史学课程实践的方法和城市公众史学,更加深入细致,为公众史学的具体实践做了理论上的阐释。可以看出,陈新、李娜更注重公众史学人才培养目标的设想,虽然也考虑到中国的实际,但受美国公众史学体系影响较大。

与此同时,周梁楷、姜萌、钱茂伟更重视将中国本土的史学大众化实践与西方的公众史学结合起来,反映出他们在构建公众史学学科体系时对中国本土的观照。周梁楷认为公众史学应该有自己专属的“学术与文化批评的知识体系”,认为公众史学应该包括三部分:书写大众的历史;写给大众阅听的历史;大众书写的历史<sup>[16]</sup>。鼓励人人书写历史,并书写大众的历史给大众阅读,重点关注于历史书写。姜萌认为公共史学应包括口述史学、影视史学、应用史学和历史通俗读物四个部分<sup>[5]</sup>。钱茂伟在这方面作了更为深入的思考,他尤其重视中国本土通俗史学的传统,自觉把中国通俗史学与西方公众史学结合起来考虑,经过反复思考,认为公众史学的学科框架包括六个部分,即通俗史学、小历史书写、公众写

史、口述史学、文化遗产、影像史学<sup>[8]11</sup>。为此,他还出版了《中国公众史学通论》一书,立足本土,借鉴西洋,筚路蓝缕,初步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公众史学学科体系。当然,迄今为止,对公众史学学科建设的讨论远没有达成共识,但基于美国公众史学的刺激,学界对公众史学学科的探讨却具有首开先河的意义,为以后中国公众史学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总体看来,新世纪以来关于美国公共史学的研究不再停留在介绍层面,而是加入了结合我国情况探讨的理论构建和实践,这无疑是迈出了一大步。然而由于在理论构建上受美国体系影响较大,对于中国本土史学大众化资源的关注还远远不够。

## 二、中国本土史学大众化的传统

中国本土究竟有没有类似美国的公众史学?公众史学存在不存在于中国的史学传统之中呢?对此,我们的观点是,当下的中国公众史学,不仅有西方的源头,还有本土的传统。从公众史学服务于公众这一重要特点看,中国早就有以史学服务大众的传统,不仅拥有自身的学术渊源和学术遗产,也具备本土实践基础。

往上追溯,中国古代就有形式丰富的历史知识的普及和传播,主要可分为书面传播和口头讲唱两种。书面传播的主要形式有史钞、幼学启蒙读物、历史演义以及各类家谱、族谱、个人传记和墓志铭等。口头讲唱则有盛行于宋明时期的说话人讲史。说话人讲史“是我国古代通俗讲史活动的一个大步跨进”<sup>[17]</sup>。虽然中国古代历史知识的普及和传播还没有形成完善的体系,但其发轫和取得的成就为“新史学”提出后历史知识普及的进一步深化和新中国成立后“通俗史学”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也成为今天建设中国公众史学的宝贵经验和珍贵遗产。

随着新史学的产生,白话文运动的兴起,以及新式学校和报纸的出现,历史知识的进一步普及具备了新的条件。一批著名史家开始关注并促进史学通俗化,梁启超、吕思勉、顾颉刚、范文澜、黎东方、胡绳、吴晗、何炳松等在通俗读物的出版和历史知识的普及上做了大量工作,一批面向大众的通俗历史读物陆续出版,如吕思勉的《三国史话》、范文澜的《大丈夫》、胡绳的《二千年间》、吴晗的《明太祖》、何炳松的《秦始皇帝》、顾颉刚主编的《中国历史小丛书》等,都是颇具影响力的通俗历史读物。

新中国成立后,“为人民写史和写人民之史”成为史学主旋律<sup>[18]</sup>,史学大众化在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上起步,既有史学大众化的实践,又试图对这一实践进行理论上的总结。

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间的史学大众化主要是以通俗历史读物的方式呈现的,代表性作品有1952年至1953年大中国图书局出版的“爱国主义通俗历史故事小丛书”;1955年通俗读物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史故事集”丛书;1958年至1966年间吴晗主编的“中国历史小丛书”和“外国历史小丛书”;1965年吴晗组织编写的《中国历史常识》丛书等。这些通俗历史读物发行量极大,均在当时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sup>[19]</sup>。与此同时,吴晗等人还对通俗历史读物的编写目的、

指导思想、原则方法等问题进行了理论探讨。一是倡导专业史家走出象牙塔,撰写通俗历史读物;二是彰显史学大众化的意义,即把史学大众化与汲取优秀的文化遗产、继承光荣的革命传统、热爱祖国、关注民族的命运结合起来;三是确立了史学大众化的指导思想,即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进行历史知识的普及工作;四是思考史学大众化的内容,主张宣扬爱国主义和人民群众对历史的推动作用;五是确立了史学大众化的原则,即做到史实准确无误,历史观正确,革命性与科学性相统一,文字通俗易懂、流畅生动,图文并茂、雅俗共赏<sup>[20]</sup>。这些原则对其后通俗历史读物的编写产生了重要影响。

改革开放后,历史知识的普及和大众化出现了新的特点。从实践层面来看,20世纪80年代,史学大众化的主要呈现方式依然是通俗历史读物。但是,90年代以后,尤其是新世纪以来,随着传媒技术的日益进步和社会氛围的宽容,史学大众化的传播形式发生了极大变化,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电视、网络、智能手机的高度普及使史学大众化的表现手段更加丰富,历史题材的纪录片和影视剧频繁见诸荧屏,专家学者的电视讲史受到观众喜爱,网络历史作品骤增,除论坛、贴吧、YY语音、新浪爱问资料等社交平台外,微博、博客、微信朋友圈、QQ等自媒体也都成为历史交流的平台。与此同时,通俗历史类图书依然热销,但其写作风格、内容和写作者与之前的同类作品差别甚大,平民书写占的比例越来越大。公众个人史书写、公众家族史书写、村史、社区史、公众历史档案也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凡人大传”、“回忆久久”网站都成为公众个人史书写的平台。“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成为这个时代公民写史的宣言。校史、企业史纷纷出现并日益受到重视。新修家谱、村志、社区志也成为近年来的一个热点,口述史的实践更是方兴未艾。各类不同的博物馆纷纷出现,成为历史知识传播的一道风景线。各地在旅游设计规划、城市规划、新农村建设中也特别注意注入历史内容。为了繁荣地方经济和文化,争抢历史名人,狂建虚假古建筑,虽负面影响较大,但也引起了大众对地方历史文化的关注。总之,改革开放以来史学大众化的主体发生了变化。原来由专业史家垄断史学大众化实践的局面被打破,公众进入到史学大众化的实践领域,参与大众史学的书写和历史知识的传播,出现人人都是历史学家、人人可以参与历史传播活动的局面。史学大众化的成果不断变成“公共话题”,出现公众热议的情况。毋庸置疑,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史学大众化最引人关注的时期。就连以研究美国公众史学见长的王希都认为,“事实上,中国一直都有‘公共史学’的实践,也拥有发展‘公共史学’的基础和资源,尤其是博物馆、展览馆、档案馆、历史遗址以及遍布各地的地方志办公室等。这些资源如能得到有效的利用,可以有力地推动公共史学的起步和发展”<sup>[14]</sup>。

史学大众化的火热自然引起人们在理论上的关注。一是从理论上解决了史学大众化的历史地位问题,赋予它前所未有的重要意义。白寿彝、刘大年、李侃、傅璇琮、高增德、臧

嵘、张岂之、黄留珠等人均从学理上论述了史学大众化的重要意义,并强调了它对史学自身发展的作用。二是从史学发展史的角度研究史学大众化的发展历程,确立了史学大众化的学科史地位。吴泽、瞿林东、彭卫、周朝民、李小树、钱茂伟、王记录等人都把史学大众化纳入到中国史学史学科发展的框架体系中进行论述,弥补了以往中国史学史学科体系不重视大众史学研究的缺陷,使史学大众化具有了学科史的资格。三是对史学大众化过程中的庸俗化倾向进行了理论反思,明确了史学大众化的内容,亦即剔除糟粕,把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交付给广大民众。四是对历史知识普及者的素养进行了讨论,把关注的目光放在了普及者的身上。五是对史学大众化的原则进行了深入讨论,齐世荣、瞿林东、张海鹏、乔治忠、汪高鑫等人均把提高民族素质、尊重历史真实当做史学大众化的根本。六是在史学大众化分支学科上的理论研究有重要收获。张广智等人对“影视史学”的研究,杨祥银、陈墨、定宜庄等人对口述史的研究,为新世纪史学大众化的理论建设开辟了新的道路。

和美国公众史学一样,中国本土史学大众化概念的使用也比较混乱,有“历史知识的普及”、“历史知识社会化”、“史学大众化”、“通俗史学”、“应用史学”等称谓。实际上,“历史知识的普及”、“历史知识社会化、大众化”、“通俗史学”等概念,核心内容都是以通俗易懂的语言、活泼多样的形式把历史知识普及到广大民众之中。“这种史学形态注重历史知识在民众中的传播和历史的实用价值,目的是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参与历史”<sup>[21]</sup>。学者除了对“通俗史学”等的价值、内容、指导思想、原则、方法等进行探讨外,还没有将它们提到学科建设的高度来看待。中国学者讨论比较深入的概念是“应用史学”,并试图上升到学科的高度来认识。1985年,蒋大椿把历史学分为“基础历史学”和“应用历史学”两大类,率先提出“应用史学”的概念,“凡是根据当前政治和社会的需要,以实现史学社会职能为任务之历史研究及其成果,便是应用历史学;凡是根据历史科学本身的必要,不带史学以外的现实目的,而以认识历史过程为任务之历史研究及其成果,便是基础历史学”<sup>[22]</sup>。基础史学和应用史学都以人类历史为研究对象,都以唯物史观为指导,都追求历史的真实,但应用史学侧重于社会服务,有更强的目的性和针对性。紧接着,刘文瑞提出“建立和完善应用史学体系”的问题。他认为,“不能把应用史学简单地看作为理论史学(又叫基础史学)的附属,而是要把二者放在同等位置”<sup>[23]</sup>。在他看来,应用史学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广泛的综合性和积极的能动性。其功能主要有四:对社会决策进行指导和选择;分析展示事物发展的前景;为政治服务;促进社会道德水平和文化素养的提高。应用史学能够修正基础史学的理论、开拓新的研究领域、促进史学与其他学科的联系。“应用史学的提出,实际上就是对史学体系的一种重新编排”<sup>[23]</sup>。可惜因为学科建设的意识不强,高校没有相关课程,更没有培养相关人才,应用史学只能是纸上谈兵,其对史学发展的革命性意义也就没有发挥出来。

通过以上梳理可以看出,中国史学大众化的实践与理论探讨具有连续性和继承性,前有所承,后有所启,并逐渐深化。史学大众化的领域逐步扩大,从通俗历史读物到新世纪以来的历史纪录片、历史影视剧、电视讲史、口述史学、公众写史、网络写史、博物馆展览、文化遗产展示等,领域扩展,涉及面愈来愈广,理论探讨的分歧也越来越大。总的来看,“对于史学大众化理论和方法的研究,尽管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基本上还处在较为零散、不够系统的阶段”,“傲慢与偏见导致理论和方法论建设的滞后,跟不上繁荣昌盛的史学大众化的实践。实际上,史学大众化的理论和方法论建设必须及时跟进其实践,及时反思史学大众化的目的、原则、内容选择、呈现手法、表现手段、受众的定位以及参与者的素养等问题。只有这样,才能推动史学大众化实践活动向纵深发展”<sup>[20]</sup>。所幸,当中国本土史学大众化理论与方法的探讨正处在瓶颈阶段时,美国公众史学传入中国,因为“他者”的介入,就为中国公众史学的发展路径与理论建构提供了新的学术资源,使得中国公众史学的发展具备了“本土”与“外来”两种实践基础和理论参照。

### 三、中西史学碰撞下中国公众史学的发展路径与理论建构

前面我们梳理了美国公众史学在中国的传播以及中国本土史学大众化的传统,让我们了解到,自20世纪70年代起,公众史学在美国兴起并逐步发展起来。而在中国,虽然没有公众史学这样的概念,但历史学应用于社会生活、为大众所接受并鼓励公众参与也一直是中国史家追求的目标之一。从公众史学的角度看,史学必须走出象牙塔,服务于社会,应用于公众,这是中外史家一致的看法。但是,“与美国在过去三十多年有序开展公众史学运动相比,中国有着完全不同的时代语境和与之呼应的历史实践”<sup>[11]</sup>。由于这种社会背景、学术背景和历史实践的不同,中国公众史学将会面临新的情况,它有什么样的发展路径,怎样根据自己的实际建构学科体系和理论体系,就成了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

前面我们说过,当下中国公众史学的发展有两个源头,一是美国的公众史学运动及其在中国的传播,二是中国本土史学大众化的实践和理论探索。二者在新世纪的中国交汇,相互碰撞与交融,学界就公众史学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触及公众史学的理论与实践、历史记忆、新媒体与历史传播、口述史学、公众史学与博物馆、影视史学、公众写史等诸多问题。中西史学观念的冲突和交流对中国公众史学的正常发展有着启迪作用。

有学者指出,“公众史学在中国至今还只是一种理念而无实践根基,学术界也没有创立自己的理论框架来指导实践以及公民对话,更没有形成一套构架完整、学理清晰的学科体系”<sup>[11]</sup>。这种判断存在问题,公众史学在中国是一个新概念,是没有问题的。但据此判断公众史学在中国没有实践根基,则是不正确的。如上节所述,史学大众化在中国有深厚的学术遗产和丰富的实践经验,问题是我们怎样根据自身丰厚的学术遗产和实践基础,借鉴美国公众史学,探索中国公

众史学的发展道路,建构中国自己的公众史学理论框架和学科体系。

(一)立足本土,借鉴西方,走出一条符合中国自身社会及历史实际的公众史学发展道路。公众史学在中国的发展,必须认识自我,借鉴别人,走自己的道路。这是因为中国史学发展有不同于西方的实际情况,中国史学服务于社会也有不同于西方的形式。从目前公众史学在中国的发展来看,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实践先行,理论滞后”。如果翻开中国史学史,人们很容易看到史学服务于大众的事例。当下中国,已经有了面向公众的多重史学实践,诸如丰富多彩的通俗历史读物的书写、电视讲史、口述史学以及在旅游规划、博物馆建设、历史街区建设、文化产业发展等领域都有着史学的身影。但是,中国应用史学虽然一直都存在着,但缺乏系统的理论总结和学科建设的意识,也没有得到学院派史学的普遍认同。因此,借鉴美国的经验就势在必行。

从其他国家公众史学的发展来看,都经历了一个本土化的过程。譬如英国,在公众史学这一概念引进之前,英国已有很多面向公众的历史产品和大众史学实践,包括历史遗产保护、电视台的历史节目、畅销历史读物等,视公众为受众。英国史家在公众史学建设过程中,并非以美国公众史学的价值导向为导向,而是选择“更能展现英国学术界自身积淀的研究”<sup>[24]</sup>。类似的情况在德、法、俄等国家也有出现。德国的公众史学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历史教育学改革,走出了一条颇具德国特色的公众史学发展道路<sup>[25]</sup>。法国的公众史学也是20世纪80年代传入的,由于法国史学传统的制约,公众史学经过与法国传统的年鉴和新文化史结合,形成了独特的公共传统和年鉴——新文化史传统<sup>[26]</sup>。俄罗斯的公众史学则是从通俗历史读物逐步发展开来<sup>[27]</sup>,与中国公众史学有着许多相通之处。也就是说,尽管公众史学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提出,然后流播到其他国家,虽然各具特色,发展程度不一,但都是在部分借鉴美国公众史学的同时,走着自己的道路。实际上,任何学科在本土的引进和发展都必须有一个适宜本土语境的解释,都需要在不同情境下经历本土化,与本土的史学实践相结合。换言之,中国公众史学的发展必须认清自我,立足本土,不能横向移植美国公众史学的模式,而是要借鉴他们的经验,走自己的道路。要在与外来思潮的碰撞中探索中国公众史学的发展路径。近年来历史学界一直在反思历史研究中的中国话语权问题,这也提醒我们,中国公众史学的研究与发展不能迷失主体意识,不能脱离中国史学所赖以依托并深深扎根其中的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在观照国外公众史学发展状况的同时,认真总结和概括中国本土史学大众化的发展,更多地运用中国话语发展当代公众史学,惟其如此,才能在中国得到更多人的接受和认可。

(二)建构中国公众史学理论体系和学科体系,必须考虑中国国家与社会的复杂关系及公众史学与专业史学(或称传统史学、学院派史学)的复杂关系。有学者从国家与社会二分的角度认识公众史学,简单地把公众史学与“国家史学”对

立起来,过分强调公众史学的公众本位,而忽视了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忽视了国家制度与公民参与之间的动态关系。在中国,国家与社会、公与私之间并没有十分明确的分界,国家制度可以建立一个促进公民参与的环境,公民参与可以进一步加强国家力量。尤其是当政府进一步转变职能,实现从全能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的过程中,公众与政府出现良性互动,公共空间不断扩大,为公众史学的存在与发展提供了条件。事实上,与政府和政策相关的历史记录与研究,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是“国家史学”,但它并不只是面向官方,也面向公众。国家档案馆、博物馆、历史遗址等都是国家机构,并非公众主导,但它们的功能却是服务公众的,历史学家在这些机构中的史学活动理应被纳入公众史学的范畴中。历史遗产和文化遗产的整理、研究与开发,旅游景区的规划等,通常也是由政府召集或由政府出资赞助的,但它的服务对象主要是公众。事实上,新世纪以来,政府对公共文化事业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这也为中国公众史学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基于这样的实际情况,中国公众史学理论体系的建构必须考虑国家与社会两个因素。另外,建构中国公众史学理论体系与学科体系,必须考虑中国历史学科的现状,不能把公众史学与国家史学、公众史学与精英史学对立起来,要认识到它们之间的区别和联系。笔者曾考察过当代中国的史学形态,发现主流史学(官方史学)、精英史学和大众史学并存,且相互影响<sup>[21]</sup>,此消彼长是存在的,但不存在对立。实际上,专业史家进入公众史学领域,官方支持公众史学的实例在在多有。专业史家一直对公共领域中的各种与历史相关的活动关注有加,且参与其中。通俗历史读物的编写者、历史纪录片的顾问、《百家讲坛》的主讲人等,都不乏专业史家。中国的“国家公祭日”活动,是全民参与的,旨在通过对重要历史问题的记忆而重构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大量政府新闻部门或电视台制作的口述纪实节目,通过对普通人生活与命运的记录,增强民众对国家历史的认同。这实际上就把官方史学、公众史学与私人史学连接在了一起。正如王希所言:“不应把公共史学简单地视为一种反官方史学或反政府史学。在一个现代民主政体中,政府与公众的关系非常复杂,不是简单的对立关系。公共史学是民主社会政治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与政府或政府的目的有千丝万缕的联系。”<sup>[6]</sup>陈新也认为“公众史学也需要考虑参与政府、机构面向公众的历史知识组织、生产和表现,如社区历史、行业历史、城市规划中的文化保护等”<sup>[7]</sup>。有鉴于以上情况,中国公众史学理论体系和学科体系的建构需要从国家、社会、官方、公众等多角度进行考虑,而不仅仅是学科内部若干相关内容的组合。

(三)进行多学科对话,是中国公众史学发展必需注意的问题。20世纪初,梁启超就在《新史学》中提到旧日史家之弊,“徒知有史学,而不知史学与他学之关系也”,强调科际整合的重要性。当下中国公众史学学科体系的建构,同样要重视多学科对话。一是中西史学观念的对话,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公众史学,理论与实践并行,有着相对我们较为完备的学科体系。让史学走出象牙塔服务于公众,是中西史学的共同

点,但是,由于中西社会性质和学术传统不同,公众史学如何服务于社会,中美史家存在着很大的观点差异,涉及公众史学的理论与实践、新媒体与历史传播、口述史学、公众史学与博物馆等诸多问题。以口述史学为例,美国的口述史学已有60多年的历史,大致经历了作为“档案实践的史学”、口述史学的“新社会史转向”、口述史学的“记忆转向”与“主体性意识觉醒”、数字化时代的口述史学等四个阶段<sup>[28]</sup>。早在20世纪60年代口述史学就进行了一系列关于美国少数族裔史、妇女史、劳工史、社区史、家庭史以及性史等新领域的研究。数字时代,美国历史协会创办了“口述历史论坛”,进行与用户的各种信息分享,美国口述史学具有“自下而上看历史”的基本史观,并强调历史学家的“中立性”,以保证整个过程的民主理念,同时强调历史的真实性与辨伪。中国大陆的口述史学兴起于改革开放后,最早的概念方法同样引进于西方,同样出现了关注社会下层、“自下而上看历史”的新视角。但我们仔细挖掘对比,不同之处仍然较多。首先在形式方面,近年来出版的各种回忆录、自述、访谈录,多数依然锁定在“大人物”或“精英人物”身上。这些作品由当事人口述或笔录并由整理者编写完成,有些则是当事人笔述,自己写下著作,和美国口述史学的下层为主、多方采集存在很大差距。口述史料的来源,在中国有三大类,分别是田野调查、新闻采访和口述访谈。田野调查、新闻采访项目通常把视角选在社会下层,研究整理人员多为社会学人员和新闻记者,而非专业史家。专业史家的缺位使得这些口述史在真实性方面经常出现偏差,记录整理者更多追求的是社会效应与文化意义,这也是与西方口述史学的差别。我们要重视中西对话,就是要从差异中借鉴经验,受到启迪。二是学科间的对话,“公众史学与普通历史学的不同之处,就是它涉及的领域更为广泛,触及区域地理、新闻传媒、博物馆学、城市规划与设计、管理学、艺术学、政治学、经济学、心理学等诸多领域,是多学科合作的结果。无论其理论形态还是实践操作,都离不开多学科的对话与合作。可以说,如果没有多学科对话与合作,公众史学很难获得发展”<sup>[29]</sup>。

(四)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深化当下中国公众史学研究的具体途径。美国公众史学的发展是理论与实践并重,而中国本土史学大众化的发展则表现为实践先行,理论滞后。当下,中国公众史学发展面临的问题既表现在理论上,也表现在实践上。就理论来讲,史学界在公众史学的诸多理论上远未达成共识。而今新的理论问题又摆在我们面前,诸如公众史学认识论、公众史学方法论、公众史学史以及公众史学与专业史学(学院派史学、传统史学)、公众史学与社会、公众史学与国家、公众史学与公众、公众史学与个人等,都需要反思和研讨。至于公众史学各分支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论,如公众口述史学、影像史学、文化遗产、通俗写史、个人史书写、家族史等,至今仍缺乏深入探讨。就实践来讲,公众史学不是书斋里的学问,其生命力在于面向公众和公众参与。因此它必须走向社会和公众,参与到现实社会的诸多活动之中,彰显其价值和意义。只有不断进行实践,才能为理论建设提

供案例,“公众史学案例库的积累是原创性理论产生的土壤”<sup>[1]</sup>,理论与实践相互作用,方可促进中国公众史学进一步发展。实践是理论建设的基础,就实践来讲,有以下方面需要注意,一是充分利用区域文化资源和学术资源,让公众史学的发展更加多样化。中国区域广大,各地发展程度不同、文化资源不同,公众史学的发展应该因地制宜,利用地方资源,展开公众史学的实践工作,积累经验,进行公众史学的深入探索。二是专业史家介入公众史学工作,加强专业史家与公共领域之间的沟通,在实践中回归理论。虽然中国本土的史学大众化已经有了较多的实践,但专业史家并没有从公众史学学科建设的角度看待这一问题。就学科建设来讲,中国公众史学的实践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专业史家不仅要成为公众历史的参与者、引导者,更要成为公众史学学科的建设者”<sup>[8]</sup>。而要成为公众史学学科的建设者,没有公众历史

参考文献:

的实践是难以成功的。以中国本土历史资源为依托,借鉴美国公众史学的实践经验,中国公众史学的发展庶几可以实现弯道超车。三是历史教学与人才培养的实践。公众史学要落地生根,必须进入现行教育体制。新世纪以来,有条件的高校已经开始设立“公众史学”课程,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宁波大学开设了“公众史学”研究生课程,培养“公众史学”硕士研究生,并在学生中开展公众历史读物阅读心理调查、组织编辑历史杂志、拍摄纪录片等活动。另有更多的院校在本科生中开设了与公众史学相关的选修课,并让学生参与口述史活动。重庆大学设立“公众史学视野下的城市历史文化保护”项目,进行了一系列关于城市公众史学的实践。今后还要将公众史学相关内容在中学进行实践,借助图书馆、博物馆、互联网以及历史遗址、遗迹和文物等资源,让中学生参与其中,书写公众史学作品。

- [1]周俊超,等。“21世纪是公众史学的时代”——中国公众史学研讨会综述[J].历史教学问题,2014(5).
- [2]罗荣渠.当前美国历史学的状况和动向[J].世界历史,1982(5).
- [3]王渊明.美国公共史学[J].史学理论,1989(3).
- [4]游恒.公共历史学在美国的兴起与发展[C]//中国留美历史学会.当代欧美史学评析——中国留美历史学者论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160—174.
- [5]姜萌.通俗史学、大众史学和公共史学[J].史学理论研究,2010(4).
- [6]王希.西方学术与政治语境下的公共史学——兼论公共史学在中国发展的可行性[J].天津社会科学,2013(3).
- [7]公众史学的中国式境遇[N].社会科学报,2014-01-02.
- [8]钱茂伟.中国公众史学通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 [9]王希.谁拥有历史——美国公共史学的起源、发展与挑战[J].历史研究,2010(3).
- [10]黄红霞,陈新.后现代主义与公众史学的兴起[J].学术交流,2007(10).
- [11]李娜.美国模式公众史学在中国是否可行——中国公众史学的学科建构[J].江海学刊,2014(2).
- [12]祝宏俊.公共史学的公共性反思[J].江海学刊,2014(2).
- [13]陈新.公众史学的理论基础与学科框架[J].学术月刊,2012(3).
- [14]王希.把史学还给人民——关于创建公共史学学科的若干想法[J].史学理论研究,2014(4).
- [15]陈新.自媒体时代的公众史学[J].天津社会科学,2013(5).
- [16]周梁楷.大众史学的定义和意义[G]//人人都是史家:大众史学论集.台中:采玉出版社,2004:27—28.
- [17]舒焚.两宋说话人讲史的史学意义[J].历史研究,1987(4).
- [18]李小树.论20世纪中国史学大众化的百年历程[J].贵州社会科学,2000(3).
- [19]许力以.中国出版百科全书[M].上海:书海出版社,1997:888.
- [20]王记录.当代中国史学大众化的历程与理论反思[J].郑州大学学报,2016(3).
- [21]王记录.当代中国史学的形态、演化及发展趋向[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14(2).
- [22]蒋大椿.基础历史学与应用历史学[J].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85(1).
- [23]刘文瑞.试论应用史学[J].西北大学学报,1985(4).
- [24]朱联璧.英国的公众史学[M].历史教学问题,2014(2).
- [25]孟钟捷.公众史学学科建设的可行路径——从德国历史教育改革模式谈起[J].天津社会科学,2013(3).
- [26]肖琦.法国的公众史学[J].历史教学问题,2014(4).
- [27]王桂香.俄罗斯公共史学的萌芽与兴起[J].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4(6).
- [28]杨祥银.当代美国口述史学的主流趋势[J].社会科学战线,2011(2).
- [29]王记录.本土化是中国公众史学必由之路[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06-03.

[责任编辑 海林]